

方
城
著

包惠僧



中共一大代表丛书

主 编 郑 惠 张静如
副主编 张树军 萧 寒 肖功柄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共一大代表丛书

主编 郑 惠 张静如

副主编 张树军 萧 寒 肖功柄

包 惠 僧

方 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125印张 170,000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2.00元

ISBN 7-202-02214-1/K·568

总 序

DI94/10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她有过自己的辉煌。

然而，当世界之舟驶入近代港湾时，这条巨龙却喘息着落伍了。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无数觉醒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探寻着救亡图存的道路。

当时间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蹒跚地走进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一件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悄悄地降临了。

1921年7月，13位年龄不一、口音不同、装束各异的年轻人，肩负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秘密聚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次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性聚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

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由此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历史将由她谱写出全新的篇章。

斗转星移！

在 20 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当年仅有的 50 多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5800 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产生后 76 年的历史过程中，她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经坎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今，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位代表都已过世。追寻他们的人生足迹和思想历程，从中探求人生的价值，寻觅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成为后人特别是历史学家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大浪淘沙！

当年一同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位代表，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有之，为人民的解放而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沦为汉奸者有之。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

这种复杂的情况，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中共一大代表的难点所在。

多少年来，研究 13 位代表的生平和思想，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这也是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95 年七八月间，我们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经过周密策划，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

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只有真实，冷冰冰的书籍才会流淌生动的音符，才会涌动生命的活力。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材料和方法。历史人物的传记写得成功与否，全赖于此。有了准确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之后，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和把

握住历史人物一生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并把历史人物活动的时空环境尽可能地再现出来，把历史的真实再现出来，从而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人物传记，才会给读者一个大体逼真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正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努力的目标。

为此，我们提出了四条编写原则：（一）据实直书而不拘泥于定论，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注重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二）史料丰富而不至于芜杂，挖掘和采用真实可靠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去粗取精，摒弃似是而非、查无实据的材料，严禁杜撰情节。（三）重点突出而不平铺直叙，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突出写传主的活动，以人和事贯穿全书，兼顾传主的思想发展和个人生活，写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色彩。（四）文字生动而不求浮艳华丽，力求达到语言生动活泼，优美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

基于上述目标和原则，同时也考虑到13位代表各自不同的多面人生，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还强调发挥各本书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作者可以阐发自己的观点，体例和风格也不强求完全一致。人物传记本来就没有一种模式、一个套路。作者在求真的前提下，以不同风格、不同体例来撰写人物传记，也可体现出人物传记写作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历时两载，我们编写的这套丛书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如果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得到或多或少的收获，那将是我们的最大快乐和欣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先后走上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何等的重要。对于这些人，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直

书他们的人生，分析他们的变化，其目的，一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二是希望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我们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可以说有些达到了，有些则还没有达到，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留下了一些遗憾。这一方面是由于挖掘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水平和方法有关。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还想强调两点：一是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参考了许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吸收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借本书出版之际，对这些同行表示诚挚的谢意。二是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史学界、出版界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10余位专家顶着酷暑，为我们审阅了全部书稿。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全力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 惠 张静如

1997年8月

目 录

引 子 争 议	1
第一章 早 年	4
玉带河畔	4
初到黄州	9
两进江城	14
第二章 求 索	23
从大关帝庙到龙王庙	23
两次不寻常的采访	29
利群书社印象	33
蛇山脚下星星火	37
第三章 结 党	47
沪穗之行	47

2 包惠僧

“一大”代表	52
五天牢狱之灾	57
第四章 初试	65
旗开得胜	65
意外的收获	73
得意楼聚会	78
江岸春早	82
紫禁城下	88
雁南飞	94
第五章 巅峰	101
不和谐的合作	101
临乱受命到黄埔	106
第二次东征	114
中山舰事件前后（上）	121
中山舰事件前后（下）	128
第六章 转折	134
意乱心悬	134
再返江城	141
在母校旧址	146
夏斗寅师党代表	153
嘉鱼历险	161
从悲观到消沉	168
第七章 歧路	176
混迹军界	176
文官任上	181
第八章 复归	189
南天引领	189

华北革大的老学生	196
栖梧老人	203
尾 声 定 论	213
主要参考书目	216
后记	218

引 子

争 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历史被时光的逝水冲刷着，有的变得清晰，有的变得模糊。

公元 1921 年 7 月下旬，13 名中国人和两名外国人聚集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时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做着一桩开天辟地的事业。

“其始也简，将毕也巨。”后来，当那个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地下小党变成拥有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大党的时候，人们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当初。然而此时，那个本来就“简”的“始”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了。

不说一般的细节，就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也弄得模糊不清。

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在各种学校的教科书上，甚至在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有关中共党史的著述中，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都被写成 12 名。

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人却有 13 名——对此，似乎没有人表示异议。

13 人参加会议，12 人是会议代表——这就是说，其中 1 人有实无名：虽出席了“一大”，却不是“一大”代表。

2 包惠僧

此人便是包惠僧。

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也是事出有因。

包惠僧本来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1921年1月，他来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因故未能成行，便留在上海工作。5月，受派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后来，他参加广东小组推举“一大”代表的会议，经陈独秀提名当选，遂赴沪出席“一大”。

于是，有人认为，包惠僧不能算作代表，因为代表总要代表一个地区或单位。

你说他是武汉的代表吧，武汉小组已派来了董必武和陈潭秋（每地代表只限2人）。

你说他是广州的代表吧，他又不是广州小组的成员。

如果硬要说他是代表，也只能算是陈独秀的代表，因为他的当选是由陈独秀提名，而陈独秀又未出席会议。

这些论据不无道理。然而，论者似乎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包惠僧确实出席了“一大”，而且与其他代表一样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也难怪，恐怕从孔老夫子提出“正名”说以来，人们就把更多的注意投在“名”上，似乎有名无实尚可，有实无名则断然不行。

退一步说，即可论“名”，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也绝非牵强。

包惠僧不是武汉小组的代表。这倒不是因为武汉小组已有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而是此时他已不是武汉小组的成员。“一大”召开半年前，他已离开武汉，而且显然不是临时离开。他离汉抵沪后，即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武汉小组的工作则由陈潭秋负责。

包惠僧应该是广州小组的代表。理由有三：

其一，他此时应算广州小组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易地活动，是否也要办理类似后来那

样完备的组织转移手续，已无从考证，但包惠僧由沪抵穗后即参加了广州小组的活动，却是确凿的事实。既然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可以算广州小组的成员，那包惠僧为什么不能算呢？

其二，他参加了广州小组的代表推选。无论有多少其他因素，包惠僧是在广州小组的正式会议上，由这个小组的全体成员推选出来的出席“一大”的代表。从程序上讲，他也应该代表广州小组。

其三，据多种史料证实，当时代表名额分配每地均为2名，包惠僧若不算广州小组的代表，广州便只有1名。当然，旅日小组也只来了1名，但已有资料表明只来1名的原因。至于广州，却迄今未见这方面的史料。

读者或许认为笔者如此不厌其详地论证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有悖于本书主旨，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包惠僧不具备中共“一大”代表的资格，这本《包惠僧》也就失去了跻身“中共‘一大’代表传记丛书”的资格。

第一章

早 年

玉带河畔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赤壁怀古》词的上阕。这首气势磅礴的“念奴娇”被后世尊为豪放词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填于黄州。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1082年，家小俱来，生活困顿，苏轼设法要来位于黄州东坡的数十亩营防废地，于此筑一草庐，题名“东坡雪堂”，从此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就在这一年，苏

轼两次游览黄州城西的赤壁矶，填了这首《赤壁怀古》词，还写了两篇《赤壁赋》。

于是，随着东坡学士辉耀千古的两赋一词，黄州——这座长江边上的古老小城遐迩闻名了。

黄州西距号称“九首通衢”的武汉三镇仅 68 公里，是黄冈县治所在地。

黄冈县地处大别山南麓，地势由东北渐次向西南倾斜，形成低山、丘陵、平原的阶梯形地貌。明万历《黄冈县志》载：“黄邑南介蕲泽，有鱼稻之利，东凭高阜以利麻桑，西临平川以利棉花，俯拾仰取，喜喜自足。”

由于离武汉较近，黄冈县乃至以它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往往得风气之先，多豪杰之士，近代以降，尤其如此。这里有几个数字，可让人略见一斑：1907 年，中国同盟会会员不足 1000 人，其中湖北 103 人，而鄂东籍同盟会员就有 35 人，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1911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中，有 75 名是黄冈县人氏。

包惠僧就是黄冈县东乡包家畈人。

包家畈位于黄冈县的第二级台阶——丘陵地区，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贯其间，滋润着满畈稻田，春来一片葱绿，秋至万顷金黄。这条小河叫夏铺河。

或许因为夏铺河水一年四季碧青如玉吧，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玉带河。玉带河将包家畈的稻田划为两片，也将包家畈的村舍分为两簇。东边的一簇，靠着狮子山，叫河东湾。西边的一簇，靠着鹄嘴山，叫河西湾。河西湾有一座土地庙——社庙，远近闻名，渐渐地，人们又把这里叫成了社庙湾。

包惠僧的家就在社庙湾。在他出生的时候，鹄嘴山上古木参天，社庙湾里只住着 7 户人家。包惠僧的家是一幢一进两栋的砖

瓦平房，大小10间，中有天井，房侧屋后被8棵绿荫如盖的大樟树簇拥着。站在门口向东望去，掠过一片低矮的山丘，可见几座鹤立鸡群的山峰，那是白云山。

包惠僧的父亲叫包存嘉，字仁和，官名肇瀛。他本是上巴河包家岗包泽久的次子，后来过继社庙湾包泽义为嗣。包存嘉两个家的祖辈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唯独他做了几天九品小官——候补巡政司，无奈好景不长，很快就弃官归田。

包惠僧的母亲杨春侠是一位出身书香门弟的贤淑女子，自幼读书习礼，18岁嫁来包家。她的娘家住溢流河鲍家店，离社庙湾5公里左右。

公元1895年1月15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腊月二十深夜，杨春侠一胎生下一儿一女。这儿子便是包惠僧。当时他不叫这个名字，据《包氏宗谱》记载，他派名复贵，庠名道亨，号贵三，别号平侯，亦号悔生，原名德芬。至于“惠僧”这个名字的来历，据说是他与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将“悔生”写成了“惠僧”，他就索性改成了“惠僧”。

包惠僧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三。在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弃官务农，靠着20多亩耕地，全家生活尚可小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中不断添人进口，负担日重，加上豪绅欺压，父亲屡涉讼案，家道渐至中落。

包惠僧后来在回忆自己的身世时写道：“余在童年，即愤豪绅横暴，官府繁苛，故立志读书，期出人头地，以雪父耻（余父曾与豪绅涉讼狱，屡受屈辱）。余父以家贫令余废学，余反抗父命，故父子感情甚恶。”^[1]

包存嘉不独不让包惠僧上学，也不让其他子女上学。这里，“家贫”固然是一个原因，恐怕主要原因还是他自身的心理障碍。包存嘉自己少年时是否上学读书，已无资料可考，但凭他后来曾

任九品官这一史实推断，至少非目不识丁之辈。他当初求学之时，自然也是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殊不知一登仕途，便遭坎坷，丢官归里之后，又似虎落平阳，屡遭欺凌。于是，按照一般的逻辑，他进行了这样的推理：肇祸是因为做官，做官是因为读书，读书自然是众祸之根、万恶之源了。非如此深恶痛绝，一位识文断字的父亲是断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自己的儿子上学读书的。

包惠僧的母亲是主张儿子上学的。1900年包惠僧6虚岁。这年夏天，父母亲为他上学的事发生了争吵。父亲盛气凌人，母亲据理力争，双方各不相让。看着父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包惠僧生怕母亲挨打，就与哥哥复霖一齐上前，抱住父亲的双腿。哪知父亲非但不偃旗息鼓，善罢甘休，反而火上浇油，愈演愈烈。小惠僧忽地使尽浑身力气，照着父亲的大腿狠狠地连咬两口，只听得“啊”的一声，小惠僧被甩倒在地。

首次交锋的结果是母子获胜，父亲暂开禁令，允准儿子启蒙。母亲给惠僧取学名道亨，嘱陈家细湾的表侄陈桂芳带他到夏铺河陈氏私塾上学。塾师熊继昌为清国子监太学生，雅号花魁先生。一般学童启蒙读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包惠僧都在家由母亲教过，熊先生开首便给他讲授《论语》中的《学而》。

3年以后，包惠僧转到瞿母山双塘邱介甫私塾。这时，他虽然只有9岁，却已经读过一些古典小说，知道不少古代名人了。他经常和同学们评论古人，其观点时有异人之处。别人都说岳飞精忠至孝，堪称楷模，他却说岳飞愚忠蠢孝，可惜可悲而不可钦。他最崇拜诸葛亮。一次，他和同学易惠年谈起“三国”。他说诸葛亮的空城计如何高明，易惠年却说诸葛亮不如司马懿。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直至动手动脚，扭成一团。最后，包惠僧硬是一石头砸破了易惠年的头。

包惠僧上学以后，父亲并未转变态度，而是时刻耿耿于怀，这

大概就是心理学所谓的“情感固执”吧。包惠僧年纪虽小，却知道好歹，你不喜欢我，我就不理睬你。父子相见，如同路人。

这年初夏的一天，刚下过一阵暴雨，包惠僧吃过早饭，背起书包上学去。走到玉带河边，正碰上父亲在那里捕鱼，他便倏地把脸一掉，绕道走了过去。这下可气坏了包存嘉。只见他把手里的钢叉猛地一掷，一个箭步跳上河堤，抓起儿子就往河水里按。正在这时，包惠僧的五叔包存乐下田走到这里。包存乐纵身跳进河里，一面抱住哥哥，一面大声呼救。湾里的人听到呼救声纷纷赶来，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包惠僧的命虽保住了，学却上不成了。从此，他整日与水牛为伴。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读书，即使在牛背上也手不释卷。

几个月过去了，包惠僧怎么也不甘心就此辍学。他找母亲，母亲要他去请表伯陈汝田来跟父亲说。

陈汝田在这一方颇有声望，人称“小孟尝君”。他与包存嘉是姑舅老表，两人自幼相交甚厚。带包惠僧入学启蒙的陈桂芳就是他的儿子。

陈汝田来到社庙湾。寒暄过后，陈汝田对包存嘉说：“表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不为别的事，就问你为么子不让复贵读书？”

包存嘉沉思片刻，头一扬道：“表哥，你问这个，我就跟你说了吧。我跟他劈开了的竹子不相粘，干脆让他学种田算了。我只看见人家挑箩筐装谷，还没有看见人家挑箩筐装字！”

“你这是什么话？我是劝你让儿子读书求功名去做官，又不是叫他学做强盗去杀人放火！你说，这个儿子你要不要？你不要，我要！”陈汝田说罢把拐杖一跺，拉起包惠僧就走。

此后，陈汝田便把包惠僧送到溢流河鲍家店一位叫陈晓榛的老秀才办的学堂。这时，陈桂芳已经转到这所学堂。他们一起在